

壁垒将要倒塌

阿蒂西·雷克斯·戈什访问IMF历史学家 詹姆斯·鲍顿

美籍西班牙裔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认为，“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的覆辙”。作为IMF的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致力于使该机构避免重犯以往的错误，并以其独特的幕后视角，为长期封闭和缺乏透明度而备受诟病的基金组织提供工作方式方面的建议。

IMF刚出版了鲍顿撰写的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IMF的官方历史的著作，该书是鲍顿为IMF撰写的第二部官方历史著作。《拆掉围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1999年》（*Tearing Down Wall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0—1999*）不仅涵盖了IMF历史上的一段激烈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全球的写照。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以及前东方集团国家向市场经济体的转变。由于IMF试图解决独联体国家后继共和政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它也被卷入了这场持续的经济危机漩涡之中。与此同时，在后方的华盛顿特区，在IMF的总部，也在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内部改革。

伴随着这段最新历史的出版，IMF研究部门的阿蒂西·雷克斯·戈什与鲍顿就书中所描述的动荡时期及其作为一名IMF的官方记录人所度过的时光进行了对话。

F&D：您即将出版的新书名为《拆掉围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1999年》，是什么让您选择了这个名字？

鲍顿：书名的用意在于唤起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发生的大事是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产生了15个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仅有少许或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经验，在上述转型阶段，IMF应要求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这对IMF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一件大事是1994年12月始于墨西哥比索危机的一系列破坏性的金融危机，随后，这场经济危机蔓延到了东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并于1998年扩大到了俄罗斯。这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那场系列性的经济危机为IMF带来了数量惊人的工作量，并对IMF的员工及基金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是全球化的10年。国家间的壁垒、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壁垒、国家间的金融资本流限制壁垒——所有这些壁垒均开始摇摇欲坠。在这本书中，我尽量以一种能够呈现其戏剧性的方式进行描述。

F&D：据我们所知，这个时期还被称为“监控期”，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监控国家状况、观察它们的汇率来确认世界经济是否运转正常，因此IMF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您能不能简单谈一谈当时发生的情况？

鲍顿：1994年年底，当墨西哥危机爆发时，很明显IMF并没有拥有足够的数据去分析了解墨西哥当时发生的情况，这也促使IMF进行了许多自我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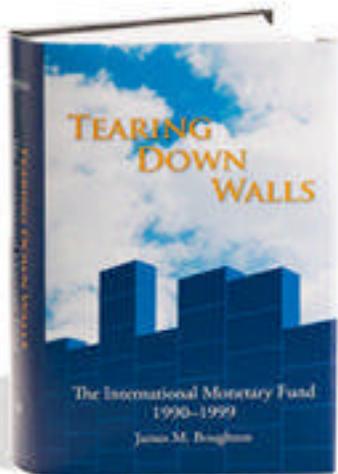
我们不得不与各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和更加紧张的合作，以便了解其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基金组织本身的整个理念变得更加透明，并且致力于鼓励国家与IMF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以更为透明的方式进行合作，这成了基金组织一个主要的关注焦点。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的文化变革。

F&D：那段历史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鲍顿：正面讯息是：当上述重大挑战出现时，世界首脑会向IMF寻求援助。我认为，IMF有能力面对挑战这一说法毫无偏颇。这样说的部分证据在于，当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再次向IMF、而不是其他机构寻求帮助。

但我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却传达出一个负面讯息，那就是危机不停地出现。人们意识到经济危机不会消失，而我认为，未来我们将看到各国会反复向IMF寻求帮助。

与30年前（1981年）我加入IMF时相比，如今的IMF已经截然不同。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化的变革，





IMF 从神秘转向开放。当时 IMF 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机构，而且也更为封闭。

F&D：对于 IMF 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是个充满争议的年代，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在亚洲经济危机与拉丁美洲经济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我们被指责为在推动“华盛顿共识”。您是如何解读这些批评的？它们是正确的吗？

鲍顿：我认为部分批评是正确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很多时候，IMF 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也没有参与到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当中。这通常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当我为撰写这本书做调研的时候，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是，最为著名、最为成功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IMF 首任副总裁的斯坦利·费舍尔告诉我，当他加入 IMF 时，他对基金组织员工几乎没有掌握足够的且他希望员工掌握的当前信息而感到震惊。他以为我们了解所有的事情，而非 IMF 的员工对很多信息则根本不了解。但事实却是，没有人掌握有足够的信息。

基金组织面临的最为严重的批评来自于亚洲经济危机。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泰国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却很难准确预测危机何时会爆发。

1997 年 7 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出席一个会议，那时我们都知道泰铢正在贬值。泰国被迫进入危机状态，并向 IMF 寻求建议。斯坦利·费舍尔当时也出席了该会议。他立刻意识到，这并不是发生在泰国的一个小小的、单独的问题，当时，他已经为 IMF 工作了将近三年。

F&D：您的书中包括很多有趣的细节和奇闻轶事，还有许多您通过查阅文献和历史事实所作的扎实的研究。您能谈谈作为一名 IMF 的历史学家的感受吗？

鲍顿：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连 IMF 都要有历史学家？”这是由于基金组织的管理层意识到，在 IMF 大楼之外的人们对 IMF 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

目睹历史

“我总认为自己站在前人的臂膀上。我看见自己正继承一项重要的传统，”作为一名 IMF 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作为 IMF 的第三任历史学家，鲍顿与 IMF 同岁。作为经济学家，鲍顿撰写了两部著作，这些多卷著作构成了 IMF 自成立至今的官方历史。

首名被委任者——基思·霍斯菲尔德发起并撰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1965 年》系列，书中描述了 IMF 的成立及其第一个 20 年的历史。

鲍顿回忆道，“当我刚从事这项工作中时，基思·霍斯菲尔德还健在，他鼓励我继续这项工作”。二人从未见过面，霍斯菲尔德退休后前往怀特岛居住，鲍顿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

霍斯菲尔德之后，玛格丽特·加里特森·德·弗里斯继任，后者出版了《压力下的体系》（*The System Under Stress*）和《试验合作》（*Cooperation on Trial*）两部著作，涵盖了 IMF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晚期之间的历史。书中对导向 IMF 创建“特别提款权”的谈判过程进行了描述。特别提款权是 IMF 专署的国际储备资金；再度爆发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基金组织也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结构调整作出了响应。

鲍顿个人对这一系列书籍的首部贡献是名为《静静的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79—1989 年》（*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书中着重介绍了该时期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这些书对 10 年历史的描述从来就不是整整齐齐的，但却保持一致，鲍顿评价说，每一卷看起来“都像是连续的自然 10 年的历史”。

鲍顿建议，在《拆掉围墙》之后，下一卷最好着重对当前的全球危机进行介绍：“IMF 为何被排除在全球性机构的历史记录之外，直到危机爆发，才被邀请加入商讨危机的解决方案”。

鲍顿目前正准备退休，不过在任命下一任继任者之前，IMF 官方历史学家的位置将会空缺一段时间。在宣布继任者之前，IMF 总会允许出现一段时间的空缺，就如同历史一样（当然也包括当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只有在一段历史落幕后，才会被记录于文字。鲍顿建议说，也许是时候在 IMF 设立一个永久的具有持续性的历史学家职位了。

不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IMF 的员工也经常会问我很多问题。当撰写政策性文章时，人们需要了解以往所采取的措施，我也可以解释在过去为何表面上看起来应该奏效的方法却未成功。也就是说，这项工作有很多个平面。

我最享受的工作是到处去对高级官员进行采访。我结识卓越的人物，倾听不凡的故事。很难对从事这项工作 20 年来的收获进行总结，但是将其撰写为文字是无比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

阿蒂西·雷克斯·戈什（Atish Rex Ghosh）是 IMF 研究部的助理主任，《西北 19 街》（*Nineteenth Street, NW.*）的作者。